

葛洪南海游记：《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新证

韩吉绍

摘要：古本《太清金液神丹经》成书于葛洪与陶弘景之间。今三卷本《太清金液神丹经》包含四部分内容：《张道陵序》为原书所有，撰于东晋后、萧梁前；主体内容太清金液丹法撰于刘宋末萧梁初；鲍靓仙遇阴长生故事在南北朝时已流传，出于葛洪的可能性不大；卷下南海游记撰于刘宋以前无疑，新证据进一步表明其确出于葛洪之手。古本《太清金液神丹经》只有一卷，今三卷本后面两部分系后人编入的附录，编入时间约在唐宋之际。卷下南海游记原来很可能是《金液丹经》葛洪注本的一部分，对研究早期南海地理和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关键词：《太清金液神丹经》；葛洪；南海游记；《抱朴子》

中图分类号：B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 (2022) 04-0088-12

公元前214年秦置岭南三郡，揭开了中国探索南海地理的序幕。两汉进一步经营南越，遂有班固《汉书·地理志》关于南海航线的首次记载，以及杨孚《异物志》关于岭南物产风俗的首次介绍。三国时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吴将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东南亚，朱氏因撰《扶南异物志》，康氏因撰《扶南传》。其时又有万震《南州异物志》、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等多种相关著作问世。上述文献汇集了早期中国关于南海地理风俗物产的宝贵资料，可惜早已亡佚。然明《正统道藏》存有一部三卷本《太清金液神丹经》^①，其卷下署名葛洪（283—363），以南海国家为中心，详记诸国之地理风俗物产文化，涉及象林、西图、林邑、扶南、典逊、都昆、比嵩、杜薄、无伦、句稚、歌营、林杨、加陈、师汉、天竺、扈犁、斯调、隐章、炎洲、大秦、古奴斯调、察牢、叶波、罽宾、月支、安息、优钱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此卷若真出于葛洪之手，则为现存最早的南海兼及世界地理记，较法显《佛国记》早半世纪，价值弥足珍贵。

1937年，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翻译考证本卷关于大秦国的内容，认为作者系伪托葛洪。^②1963年，陈国符认为，“永兴元年（二十一岁），洪径诣洛阳，欲广求异书。正遇上国丧乱，北道不通，乃周旋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阅见流移俗道士数百人。光熙元年（二十四岁），往广州，遂停南土，尝由日南（即今越南之顺化一带）往扶南（扶南国即今柬埔寨与越南南部）（其后因所闻见，记晋代南洋产丹砂之国，附于《太清金液神丹经》之后）”。^③1970年，饶宗颐首次详细考证本卷，发现两个重要事实：一是书中“并无孱人刘宋以来之南海事迹，且从书中用韵观察，决不能迟至六世纪”；二是“作者于《南州异物志》取材独多，亦尝参据康泰书。……此经大半钞自万震，其资料之素材，可信为依据三世纪之记录，不容忽视”。^④至于书是否出于葛洪，饶先生未遽断，只猜测“使此书可信，则洪之游扶南乃值光熙间南来就广州参军任之后，本传所谓‘停

作者简介：韩吉绍，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道教与汉魏两晋南北朝史研究”（18BZS047）

① 详见《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册，第746—762页。下文引《太清金液神丹经》，不再细注。

② 转引自饶宗颐：《〈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0年第1期。

③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77页。

④ 饶宗颐：《〈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0年第1期。

南土多年’时也”；“其记产丹诸国地理可能作于再度南来之时，则在《抱朴子》成书之后矣”；“如系拱手笔，当作于咸和六年求为勾漏令之后”。1994年，冯汉镛发现葛洪《抱朴子》记载有多种印支特产、扶南土俗及文化，认为若非作者亲身目睹，其认识很难如此深刻，而且大部分特产都是最先见于葛洪著作，表明葛氏确曾去过印支。^① 2005年，丁宏武发现本卷自述性内容及思想感情与《抱朴子》高度吻合，亦主张作者为葛洪，认为葛洪扶南之行当在306至310年间，撰写本卷则在晚年。^② 2006年，曾达辉也主张本卷为葛洪晚年所撰，但之后个别词语曾被涂改：“葛洪不屑于天师道，《抱朴子》多言‘学道’而未尝见‘奉大道’等天师道用语，而道藏本《神丹经》卷下则数言南洋西域国民之‘奉大道’，可见此篇个别词句曾遭改窜。”^③ 2010年，王家葵认为：“本经作者没有海外之旅，全篇都是依托万震《南州异物志》而成。至于作者是葛洪，还是葛洪的后学，不得而知。”“尤其可怪者，杜薄国据《通典》‘隋时闻焉’，顿逊‘梁时闻焉’，无伦国亦‘隋时闻焉’”。“从文章风格来看，本经确实不堪与葛洪《抱朴子》内、外篇媲美，出于葛洪后学之手的可能性较大。……六朝隋唐应该是本经最可能的制作时间”。^④ 其他意见，如《道藏通考》：“没有证据表明本卷出于葛洪之手，但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非葛洪所撰。伪造葛洪道教著作的人似乎不太可能选择这一主题。无论如何，本卷至少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220-589）。”^⑤ 又如宇汝松认为，《抱朴子内篇》谓葛洪曾“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当初陈国符因为误将“江”看成“交（州）”而推断葛洪交趾之行在其早年，实际应在其晚年时。^⑥ 谭清华、袁名泽亦认为葛洪往扶南的时间应在其早年停留南土期间。^⑦

上述研究揭示了《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的部分历史事实，但存在不少争议和严重误解，特别是囿于卷下立论，没有从三卷本整体进行考察，从而对卷下的作者及来龙去脉认识不清。为更全面地认识卷下的重要历史价值，本文拟在整体考察三卷本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卷下的撰作时代和作者进行补充研究。

一、古本《太清金液神丹经》的由来

（一）从金液到《金液丹经》

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文明相比，中国对黄金的认识和利用要晚得多。在先秦，黄金一直未进入中国主流信仰体系，其地位不能与玉石比肩。玉很早就与不朽观念有密切联系，但黄金最初却没有不朽或不死的信仰功能。黄金与不朽观念建立联系，始见于汉武帝时期。^⑧

《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颇留心长生之术。“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

① 冯汉镛：《葛洪曾去印支考》，《文史》第39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9-69页。

② 丁宏武：《葛洪扶南之行补正》，《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后来，丁又著《〈道藏〉洞神部所收一篇葛洪佚文及其文献价值》（《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对本卷文字进行了点校。

③ 曾达辉：《〈太清金液神丹经〉与〈马君传〉》，《清华学报》（台北）2006年新36卷第1期。

④ 王家葵：《〈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研究》，姜生、汤伟侠主编：《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4-879页。

⑤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D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105.

⑥ 宇汝松：《葛洪交趾丹道之行考论》，《史志学刊》2015年第2期。

⑦ 谭清华、袁名泽：《葛洪扶南之行再考》，《山西师大学报》2017年第3期。

⑧ 韩吉绍：《道教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43页。

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①这是目前所知关于炼丹术最早的确切记载。关于“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唐初《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之语可作为注解:“以丹为金,以金为器,以器为贮,服食资身,渐渍肠胃,沾溉荣卫,籍至坚贞,以驻年寿。”^②经汉武帝亲自倡导,神仙黄冶之术很快泛滥,并出现一些专门著作,如《汉书》提到的刘安《中篇》八卷(或谓《枕中鸿宝苑秘书》)、《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等。

东汉时,随着炼丹术的进一步发展,金丹与黄白逐渐分流,进而出现“金液”之说。东汉《黄帝九鼎神丹经》曰:“黄帝受还丹至道于玄女。玄女者,天女也。黄帝合而服之,遂以登仙。玄女告黄帝曰:凡欲长生,而不得神丹金液,徒自苦耳。”^③两晋之际,葛洪首次提及汉末以来流传的第一部金液文献《金液丹经》。《抱朴子内篇·金丹》云:“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于从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之不书者。江东先无此书,书出于左元放,元放以授余从祖,从祖以授郑君,郑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④依其说,金液与九鼎丹、太清丹乃炼丹术早期最重要的三种大丹法。

关于金液的神学渊源、制法、功效等,葛洪云:“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减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其经云,金液入口,则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于元君……百日成,服一两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斋戒百日矣。若求升天,皆先断谷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两,则长生不死,万害百毒,不能伤之。……若复欲升天者,乃可斋戒,更服一两,便飞仙矣。”^⑤可见,制作金液最关键的药物是黄金,以其杂诸药“封之成水”——由黄金等药物制得的溶液,便是“金液”称谓的由来。

葛洪所说的三部丹经,其中《太清丹经》乃《太清观天经》的下三篇,《九鼎丹经》乃《黄帝九鼎神丹经》。由此推测,《金液丹经》也是一个简称,不过其原名不可能是《太清金液神丹经》。

(二)《太清金液神丹经》的出现

太清,亦作“泰清”,早见于先秦文献。如《庄子·天运》:“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鹖冠子·度万》:“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泰宁,中及万灵。”后人释其为天或天道,当近古义。^⑥最迟至西汉,太清与神仙思想结合起来。《楚辞》载刘向《九叹·远游》云:“譬若王侨之乘云兮,载赤霄而凌太清。”东汉王逸注:“譬若仙人王侨乘浮云载赤霄,上凌太清,游天庭也。”^⑦不过对太清的特点,直到葛洪才予以描述。《抱朴子内篇·杂应》云:“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剽,能胜人也。师言鸾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剽炁故也。龙初升阶云,其上行至四十里,则自行矣。此言出于仙人,而留传于世俗耳,实非凡人所知也。”^⑧

早期炼丹术都强调飞升入太清,金液如上文所见,九鼎丹亦如此。《黄帝九鼎神丹经》云:“服神丹令人神仙度世,与天地相毕,与日月同光,坐见万里,役使鬼神,举家升虚,无翼而飞,乘云驾

①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5页。

② 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6页。

③ 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第1页。

④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页。

⑤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82-83页。标点略有改动。

⑥ 如唐成玄英疏:“太清,天道也。”(《淮南子·精神训》)又如北宋陆佃云:“太清,天也。泰宁,地也。”参见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5-156页。

⑦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9页。

⑧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75页。

龙，上下太清，漏刻之间，周游八极，不拘江河，不畏百毒。”^①太清丹地位更高，直接与太清天关联：“复有太清神丹，其法出于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师也。《太清观天经》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无足传，常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经上中下，凡三卷也。”^②不过，无论《金液丹经》还是《九鼎丹经》，最初都与《太清丹经》泾渭分明、互不相干。

葛洪之后，随着道书的大量造作，其分类方法出现重要变化。先是刘宋陆修静撰《三洞经书目录》，正式确立三洞分类法；后萧梁孟法师撰《玉纬七部经书目》，确立三洞四辅之七部分类法。“四辅”指太清、太平、太玄、正一等四部；“太清”用以统称金丹类道书。因丹经皆称服丹可飞升太清天，故“以境曰经”：“太清者，孟法师云：大道炁之所结，炁清体太，故曰太清，以境曰经也。今谓此经，从所辅之境得名，何者？此经既明金丹之术，服御之者远升太清，故言泰清也。”^③可以想见，在七部分类法创立前，当有不少以“太清”命名的金丹著作行世。

《太平广记》卷五十七《太真夫人传》称，太真夫人遇马明生，欲仙之，向其推荐安期生，并强调安期有“金液丹法”：“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者矣。明日安期当来，吾将以汝付嘱焉。汝相随稍久，其术必传。”^④此传虽称出自《神仙传》，但显然晚于葛洪。其言金液丹法为元君太乙之道，与《抱朴子内篇》所记一致，而且后者还说，“安期先生、龙眉宁公、修羊公、阴长生，皆服金液半剂者也。其止世间，或近千年，然后去耳。”^⑤不过，《太真夫人传》又称此金液为“太清金液之华”：“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龙胎之醴，二名玉胎琼液之膏，三名飞丹紫华流精，四名朱光云碧之腴，五名九种红华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华，七名九转霜雪之丹，八名九鼎云英，九名云光石流飞丹，此皆九转之次第也。”^⑥那么，太清金液之华与《抱朴子内篇》所说金液是什么关系呢？

梁天监三年（504），陶弘景应梁武帝之请炼丹，颇费功夫选择丹法。据唐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先生以谓丹品盖多，黄帝九鼎九丹、王君虹景、左慈九华、五灵七变、神精、召魂之属，或方法舛略，难可凭用；或品例卑近，不得高通。复有二金液，亦营合有碍。高真上法有四”，可知时有两种金液法流传。贾氏注引陶弘景《登真隐诀》云：“一者太一金液，抱朴子所注，此乃可就，而阙在消石，兼无真人手迹，弥所未安。二者即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传，而用卤咸、虜盐，此世难多，兼祭法用牢俎，以为惮碍之也。”^⑦其太一（太一即太乙元君）金液由葛洪作注，显为《抱朴子内篇》所述《金液丹经》之法；而托名安期生所传的泰清金液实出于葛洪之后，即《太真夫人传》所言者，其经本即古本《太清金液神丹经》。

二、今本《太清金液神丹经》的内容和时代

古本《太清金液神丹经》早已不存，其卷数宋前文献未见记载。北宋《崇文总目》首次著录时作“《金液神丹经》三卷”，其后南宋《通志·艺文略》同，《宋史·艺文志》著录作“《太清金液神丹经》三卷”。据此推断，宋人所见版本为三卷本。宋真宗时编撰《大宋天官宝藏》，三卷本《太清金液神丹经》收录其中，其节本见于《云笈七籤》。此后宋金元明多次重修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递传不绝。由于古代道藏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明《正统道藏》，故其收录的三卷本《太清金液神丹

① 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第1页。

②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6页。

③ 《道教义枢》卷二，《道藏》，第24册，第814页。

④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1页。

⑤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53页。

⑥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353页。

⑦ 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道藏》，第5册，第505-506页。

经》(以下简称《神丹经》)便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完本,但源自宋本无疑。^①

三卷本《神丹经》卷上题“正一天师张道陵序”,先以张道陵之名谈道,复以其弟子赵升、王长之名作注,后为炼丹宜忌与规范、“金液丹华”歌文、丹法及祭受法等;卷中题“长生阴真人撰”,前为“金液还丹”歌文与丹法,后为附录,包括附录说明与葛洪所记鲍靓仙遇阴长生之事;卷下即“抱朴子序述”之海外地理。概言之,《神丹经》是以金丹为中心,糅合重玄理论、太清金液丹法、鲍靓仙遇阴长生、葛洪南海游记等四部分内容,而形成的一部重要的古代哲学、科技、海外地理综合性著作。

《神丹经》的成书问题今人众说纷纭。如《道藏提要》言:“本书依托(阴)长生、张陵等神仙传说,虽不足信,然本书固亦六朝道经。”^②孟乃昌认为:“三卷本当非一人一时之作,是一个合集。……疑《太清金液神丹经》首先是合并葛洪所见《太清神丹经》与《金液丹经》二书而成今本之主体。”^③《道藏通考》曰:“这是一个不同文本的合集,部分为炼丹内容,其他与炼丹间接相关或者毫不相干。”^④曾达辉认为,东晋时某天师道祭酒袭取葛洪《神仙传》中马鸣生、阴长生故事,编成单行本《马阴二君内传》,其内容除二君新传外,亦包含其所受之金液丹经,此丹经是在篡改旧籍的基础上编造而成。唐宋之际,书中炼丹内容被割裂别行,并附录葛洪关于阴君见世显形和海外生丹诸国两篇杂记,合成三卷本《神丹经》。^⑤萧登福说:“其书应即是葛洪《抱朴子·金丹》所载的《金液丹经》;如此则其撰作年代,当在汉世,且应在张陵前的西汉末或东汉初。”^⑥上述言说或缺乏论证,或认识有误。欲知《神丹经》的确切编撰时代,首先应详细分析书中每部分的著作时间,然后再进行整体审查。由此亦可为正确认识卷下本原提供重要参照。

(一) 重玄之论

《神丹经》篇首《张道陵序》含序文和序文注解两部分。序文先论道,认为道犹如觉悟,否定“恋有”与“乐无”,主张“达观兼忘,同归于玄。既曰兼忘,又忘其所忘,心智泯于有无,神精凝于重玄”;其次盛赞《老子》“既洞明于至道,又俯弘于世教”,其为辞、叙事、取类等皆“大哉妙唱,可谓神矣”;最后强调金丹之功“玄神洞高,冥体幽变,龙化灵照”。注解部分侧重介绍闭气行气之法。通观整篇文字,有几处颇能反映时代特点与作者背景。

其一,重视《庄子》,提出重玄之论。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首开玄风。不过,玄学家们接受《老子》《庄子》有一个渐进过程,正如学者所言,“正始玄学的思想资料是《老子》。到了竹林玄学,《庄子》始受重视;至郭象玄学,庄子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已占据支配地位”。^⑦玄学的成熟进而引出重玄学。唐代高道成玄英将重玄的宗源追溯至东晋孙登。今卢国龙也认为,孙登的思想学说是“出于玄学家对《老子》理论的阐发,与魏晋神仙道教无关,也不是隐士的思想。重玄理论被道教所吸收,是南北朝以后的事,它的发生则根植于魏晋玄学”。^⑧该序文倡导发挥《庄子》思想,以达观兼忘同归于玄、复忘其所忘而致重玄境界,同时又非常重视神仙方技,其时应在东晋以后,而托名于张道陵。

其二,倡导养生唯气与丹的思想。序文云:“炜寂观三一之乐,标镜营六九之位。闭气长息,以争三辰之年。胎养五物,以要灵真之致。”注文详解如何闭气、行气与胎食,并强调“夫养生者,唯气与丹”。魏晋文献罕言张道陵与金丹有关,相关传说在南北朝方广为流传。至于行气,则是天师道

① 关于北宋至明代道藏的编撰及其关系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30-177页。

②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0页。

③ 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④ Schipper and Verellen, eds., *The Daoist Canon*, p. 104.

⑤ 曾达辉:《〈太清金液神丹经〉与〈马君传〉》,《清华学报》(台北)2006年新36卷第1期。

⑥ 萧登福:《正统道藏总目提要》,北京: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第848页。

⑦ 康中干:《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⑧ 卢国龙:《道教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的固有传统，早在汉末《老子想尔注》就非常重视气的运用。^①但是，从思想发展逻辑而言，气丹并重视观念应出于葛洪首倡金丹为仙道之极以后。加之，序文注解征引《服气经》《黄庭经》等文献，依《道藏提要》，“卷上之‘注’中引有‘玉池清水灌灵根，子能修之可长存’以及‘口为玉池太和宫’等《黄庭外景经》《黄庭内景经》语，则此书当出自晋以后”。^②

其三，提到九丹之品号。序文“标镜营六九之位”句，注解称“九者，九丹之品号，太真王夫人已具记之焉”。上文言《太平广记》载太真王夫人向安期生介绍九种仙丹，此观念明显不同于葛洪所记魏晋炼丹传统，当出于南北朝。

除上述具有时代特征的因素外，该序文在宋前至少有三次被征引或提及：

第一，《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第四》所述某行气法与序文注解“标镜营六九之位”介绍的行气法相近。前者云：“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此男女俱存法，法出于《仙经》。”^③可惜陶弘景只笼统称出自“仙经”。唐代道经《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秘要口诀》一段引文与序文注解更接近，称出自张道陵，当指本书：“天师云：纳气有一，吐气有六，……悉能六气，位为天仙。”^④

第二，唐前期编《道教义枢》卷十《有无义第三十六》言：“《金液经》云：有有则甚惑，乐无亦未达。达观兼忘，同归于玄。既曰兼忘，又忘其所忘，知泯于有无，神凝于重玄，穷理尽性者之所体也。”^⑤此处“《金液经》云”后文字亦见于序文，此《金液经》显然是《太清金液神丹经》。

第三，《太平御览》卷六七“道部十三”引陶弘景《登真隐诀》文，明确提到张道陵曾撰《太清金液丹序》：“太清正一真人张道陵，沛国人，本大儒，……天师《灵寔伍符序》及《太清金液丹序》并佳笔，别有传，已行于世。”^⑥

综合以上证据可以推定，《张道陵序》为《神丹经》原有内容，撰于东晋以后、《登真隐诀》成书时的萧梁以前。^⑦

（二）太清金液丹法

太清金液丹法是《神丹经》的核心内容，从篇幅上看，亦为卷上和卷中的主体。书中记载了两种金液丹的制法。第一种为卷上的“金液之华”，又称“金液丹华”，内容包括炼丹宜忌与规范、“金液丹华”歌文、作六一泥法、合金液丹华法、服丹试丹法及祭受法等。第二种为卷中的“金液还丹”，内容包括“金液还丹”歌文、合金液还丹法、服丹法及合丹辅药诸法等。两法的核心是两首七言歌文，其中有三处小字注释。第一处在“金液丹华”歌文后：“此《太清金液神丹经》文，本上古书，不可解，阴君作汉字显出之，合有五百四字。”第二处在“金液还丹”歌文后：“凡六十三字。本亦古书难了，阴君显之。”第三处在整首歌文末尾：“《太清金液神丹》凡五百七十六字（应为五百六十七字），句凡七字，《金液》凡五百四字，《还丹》凡六十三字。”总其意，即《神丹经》最初只有五百六十七字的两首歌文。陈国符认为，两首歌文用韵有西汉亦有东汉例，应于西汉末东汉初出世。^⑧对于整部丹经，他认为“至迟已于梁代出世。至葛洪在世时已有此书否，疑不能决”。^⑨笔者认为，丹法多处细节已透露其撰写时代与背景：

① 刘昭瑞：《〈老子想尔注〉导读与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55页。

②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390页。

③ 王家葵：《养性延命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6-157页。

④ 《道藏》，第18册，第431页。此法又见《云笈七籤》卷六十一《服气杂法秘要口诀》。

⑤ 《道藏》，第24册，第835页。

⑥ 此据王家葵：《登真隐诀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3页。

⑦ 据王家葵考证，《登真隐诀》在齐末已撰成，入梁后仍有修订和增补。王家葵：《登真隐诀辑校》，“前言”，第3-5页。

⑧ 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5-78页。

⑨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377页。

其一,卷上合药祭祀部分云:“甘橘诸饼果甚善。北方无甘橘,不得者止也。”说明丹法撰于南方地区,并特意关照到北方读者。

其二,卷上“合丹法”使用“越丹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成书于公元 500 年前)云:“《仙经》亦用越沙,即出广州临漳者。”^①此《仙经》很可能指本书。刘宋于泰始七年(471)置越州,治所在原属于广州之地的临漳。《宋书》卷三十八载:“越州刺史,明帝泰始七年立。……临漳太守,先属广州。”^②由此,本书所谓“越”应指越州,故丹法当撰于公元 471 年以后。

其三,卷上“祭受法”用“写经纸墨笔砚别着祭左右”,说明当时用纸已很普遍,此非汉代特征。

其四,卷中“作枣膏法”见于唐初道经引用。唐高宗显庆年间成书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八有“炼枣膏法”,云“出《金液·枣膏和丹用法》”。^③这段文字与今本“作枣膏法”大体一致,说明其《金液》即《太清金液神丹经》。

其五,卷中“作霜雪法”云:“霜雪所用曾青、戎盐、凝水石皆贵药,不可用交代,非真则药不成也。”其所述乃魏晋南北朝特有现象。其时因政权割据,给南北贸易造成巨大障碍,很多普通药物也珍贵难得,于是人们发明了制作药物的替代方法,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八汇总了多种以别药合成硝石、戎盐、石胆、石脾等法,正是“古人以四方分隔,觅不可得,使作代用,乃胜真者”。^④

其六,上引《登真隐诀》提到《神丹经》的部分内容:“二者即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传,而用卤咸、虜盐,此世难多,兼祭法用牢俎,以为惮碍之也。”相较今本,“作六一泥法”用到戎盐、卤碱;“作霜雪法”用到曾青、戎盐、凝水石、代赭等;合药祭祀需安釜作坛,炊米备果,净席四枚,洁盘九枚,杯子或大形瓿子八十一枚,祭如祭天地神祇,樽杓自副,又用香火九炉等等;“祭受法”又用沉香、鸡头,盘杯炉等若干。以上所述皆与陶弘景所见文本相合。

综上所述,《神丹经》当撰于刘宋末萧梁初。关于两种金液的合炼方法,曾达辉“固有自出胸臆处,亦有袭用旧籍处,其具体合丹营炼法多取诸《黄帝九鼎神丹经》”^⑤之说有误,因为两书涉及的化学技术并不相同。

(三) 鲍靓仙遇阴长生与东晋国运预言

《神丹经》卷中后半篇并非丹经本文,而是一个附录,其内容包括说明部分和葛洪述鲍靓仙遇阴长生事部分。

说明部分,作者首先引郑隐之言,强调“自丹经神化者,着在实验,是故天尊真人隐秘此道”,然后盛赞马明生(或“马鸣生”)与阴长生“何但仙人而已!至于观察纬度,知国存亡,审运命之盛衰,验未然之必然,覆生民之大慈,作群方以定物,名始接圣齐光,玄照万品,可谓朗矣!可谓神矣!”因此特意“书二君神光见世之言,自汉灵以来称说故事,附于丹经纪载之焉”。

今本《抱朴子内篇》未言马明生,两次提及阴长生的炼丹活动。一云:“近代汉末新野阴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着诗及丹经赞并序,述初学道随师本末,列己所知识之得仙者四十余人,甚分明也。”此太清丹出自葛洪所受《太清丹经》。又云:“昔安期先生、龙眉宁公、修羊公、阴长生,皆服金液半剂者也。其止世间,或近千年,然后去耳。”^⑥此金液出自葛洪所受《金液丹经》。今本《神仙传》有马鸣生和阴长生的传记,述二人传授《太清丹经》(非《金液丹经》)的经过。不知何故,本书未附二人的炼丹故事,却强调其鲜为人知且与丹经无甚关系的政治预测神力。更奇怪的是,前面金液丹法部分并未提及马明生,附录后文亦无其事例,更无汉灵以来称说

① 尚志钧、尚元胜:《本草经集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

②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8页。

③ 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第279页。

④ 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第123页。

⑤ 曾达辉:《〈太清金液神丹经〉与〈马君传〉》,《清华学报》(台北)2006年新36卷第1期。

⑥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7、53页。

故事。

关于葛洪述鲍靓仙遇阴长生之事，其梗概和时间线为：司马睿创立东晋的太兴元年（318）10月6日，鲍靓告诉葛洪，是年8月22日，靓于建康之蒋山遇阴长生。阴君授靓刀尸解之法，又预言东晋盛衰：“今日甲申（324）之后，乙酉（325）、丙戌（326）之年，二主将逝，贼填其间。逮乎坎方祸乱，殆致颠覆，得甲申万遗一人。若修式准、泗，先登胜地，据魏阳、北海西，上应于斗度，下合乎地气，从今以去江南为始，可得六十六岁，甲戌（374）之间祚之终矣。要自縊连争斗，至于甲申（384）。若凶修则促，福禳则延。至于斯厄之竭，俱臻此年矣。从今到甲申，正当余七十六年矣。”然后葛洪记应验之事：“太宁二年岁在甲申（324），果有大将军王敦之变。到三年乙酉（325）二月二十四日，元帝崩。四年丙戌（326），明帝崩。咸和三年（328），苏峻领群贼十万，北登蒋山。是阴君所行处，皆为贼营，计足十年矣。”葛洪复记太兴元年（318）鲍氏以阴君所言表元帝，元帝咨询王导；最后记鲍氏死后刀尸解之证。

上文中透露的写作时间是咸和三年（328），是时“苏峻领群贼十万，北登蒋山”，距离阴君到蒋山“足十年”。令人困惑的是，其中有多处严重谬误，如太兴元年（318）至甲戌（374）间隔56而非66年，至甲申（384）间隔66而非76年，元帝崩于永昌元年（322）而非太宁三年（325），明帝崩于太宁三年（325）而非太宁四年（326）。史载，葛洪与东晋朝廷渊源颇深：“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①若本故事出于葛洪之手，仅仅数年的历史记忆，他怎会出现如此多的严重谬误！然而，鲍靓仙遇阴长生事确有多种早期记载佐证，有的明确提到作者是葛洪。

其一，《太平御览》卷六六三《道部五·地仙》引陈马枢《道学传》曰：“鲍靓字太玄，以太兴元年八月二十日步道上京，行达龙山，见前有一少年，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去殊疾。靓垂名马密逐数里，终不能及，意甚异之。及问曰：视君似有道者。少年答曰：我中山阴长生也。”^②此条可证鲍靓仙遇阴长生之事出于陈之前。

其二，《太平御览》卷六六五《道部七·剑解》引六朝道书云：“昔葛洪云阴君授鲍靓尸解之法，后死，埋石子岗，有人发其棺，见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马之声，遂不敢取。”^③此条可证葛洪记鲍靓死后刀尸解之事确为六朝掌故。

其三，《真诰》卷十二言，鲍靓“所受学，本自薄浅，质又挠滞”，陶弘景注：“鲍亦通神，而敦尚房中之事，故云‘挠滞’。后用阴君〈太玄阴生符〉，为太清尸解之法，当是主者之最高品矣。”^④此条可证鲍靓遇阴长生并受《太玄阴生符》刀尸解法的故事出于陶弘景之前。

其四，《无上秘要》卷八十三《得地仙道人名品》云：“鲍靓，字太玄，琅琊人。晋元、明帝时，为南海太守，阴君授其解法得道。”^⑤此条可证东晋初鲍靓遇阴长生并受尸解法之事流传于北周以前。

其五，《晋书》卷九十五《鲍靓传》云：“靓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⑥此为概述，背后必有详据，而《晋书》既采纳之，撰者显然信其为史实。

综上可断言，葛洪述鲍靓仙遇阴长生之事在南北朝流传已广。曾达辉认为，此部分当是葛洪手笔，并非假托。^⑦但上述分析表明，整个故事漏洞很多，出于葛洪之手的可能性不大。如系假托，撰于咸和三年亦无可能，毕竟当时葛洪正值中年，而且名声远谈不上显耀。

①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11页。

②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961页。

③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第2968页。

④ 陶弘景：《真诰》，赵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1-212页。

⑤ 《无上秘要》下，周作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13页。

⑥ 《晋书》，第2482页。

⑦ 曾达辉：《〈太清金液神丹经〉与〈马君传〉》，《清华学报》（台北）2006年新36卷第1期。

(四) 葛洪南海游记

《神丹经》卷下同样是一个附录,作者所述编入原因为:“今撰生丹之国,纪识外邦,并申愚心,附于《金液》之后,常藏宝秘,则洪辞永全。……今以羸文结托真书,求自存录者也,诸弟子可以广视听也。”整卷文字含序言与正文两部分,题名曰“抱朴子序述”。

序言首先阐述大地理观,作者以亲身经验说明大九州说的合理性;然后解释之所以不辞劳苦去往边远之地,“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继之感慨身穷世乱,觅得海外神奇之地,立誓“不嫌其遐而欲之其邦,不辞其辽而必到其乡”。正文介绍世界诸国,作者自当时日南郡象林县出发,由海路到达扶南国,再以扶南为基地记叙其他国家。关于本卷是否由葛洪编撰,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强调三个事实、排除两个误解。

事实一,葛洪一生有两次南游经历,已有研究清晰揭示其详情。第一次是光熙元年(306),葛洪时值青年约24岁,“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葛洪约30岁遇鲍靓并师事之,约32岁(314)返回家乡句容。第二次是葛洪晚年约50岁时,“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址出丹,求为句扁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①

事实二,葛洪第二次南游选择交址,与第一次南游经历有直接关系。丹砂是炼丹最重要的原料,秦汉以来只有巴地可寻,直到《名医别录》仍说丹沙“生符陵,采无时”。^②后来巴地资源枯竭,方有南方临漳新产地。陶弘景云:“符陵是涪州,接巴郡南,今无复采者。乃出武陵、西川诸蛮夷中,皆通属巴地,故谓之巴沙。《仙经》亦用越沙,即出广州临漳者。此二处并好,惟须光明莹澈为佳。”^③临漳之地原属广州,刘宋末泰始七年(471)置越州,治于临漳郡,故陶氏云“越沙,即出广州临漳者”。不过,丹砂之难得早在东晋时已见端倪。《真诰·稽神枢第四》载:“衡山中有学道者张礼正、冶明期二人,礼正以汉末在山中服黄精,颜色丁壮,常如年四十时。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泽泻、柏实丸,乃共同止巖中。后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从来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难得,俱出广州为沙门。是滕含为刺史时也。”^④滕含《晋书》卷五十七有传:“初为庾冰轻车长史,讨苏峻有功,封夏阳县开国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将军、广州刺史。”^⑤葛洪年轻时虽然掌握大量丹经秘法,但未有任何炼丹实践,原因就是买不到药物:“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诀之不书者。……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资无担石,无以为之,但有长叹耳。”“而余贫苦无财力,又遭多难之运,有不已之无赖,兼以道路梗塞,药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⑥因此葛洪晚年欲炼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药物问题,他径直选择交址郡,必有充分调查,否则皇帝亦不可能应允。

事实三,今本《抱朴子》只是原书之残卷。《抱朴子外篇·自叙》称“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晋书·葛洪传》引《抱朴子内篇序》称“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故王明曰:“现行本《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二篇,内外篇合计仅有七十二篇,距一百一十六篇尚差四十四篇之谱。这四十四篇显然亡佚了。所以严可均《铁桥漫稿》六《代继莲龕为抱朴子叙》云:‘今本仅《内篇》之十五六,《外篇》之十三四耳。’”^⑦因此,今本《抱朴子》所不载者,不可轻断原书无有。

① 《晋书》,第1911-1912页。

② 陶弘景集:《名医别录》,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2页。

③ 尚志钧、尚元胜:《本草经集注》,第129页。标点略有改动。

④ 陶弘景:《真诰》,第252页。

⑤ 《晋书》,第1554页。

⑥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1、283页。

⑦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序言”第18页。

误解一，认为本卷经后人窜改。如曾达辉谓“奉大道”为后人窜改痕迹。“大道”之语，今本《抱朴子内篇》确实未见，但《外篇》多次使用，如卷二“风成化习，大道渐芜”，卷四“舍败德之峻涂，履长世之大道者”，卷七“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①卷四十九“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②

误解二，认为本卷有的内容晚出。如王家葵谓杜薄与无伦据《通典》“隋时闻焉”，谓典逊（顿逊）据《通典》“梁时闻焉”。《通典》记载可据《法苑珠林》和《太平御览》纠谬。杜薄，据《法苑珠林·华香篇第三十三》知《南州异物志》已记之，曰“杜薄州”。^③又，《御览》卷七八七多次引康泰《扶南土俗（传）》曰“诸薄”，卷八二〇引《吴时外国传》作“诸簿”，可见其早期就有多种译名。无伦，据《御览》卷七九〇知《南州异物志》已记之。典逊，据《御览》七八八知《南州异物志》已记之。^④

以上两个误解被排除，再次证明饶宗颐关于本卷“并无驩人刘宋以来之南海事迹”的观点准确无误。那么，作者是否为葛洪呢？

关于本卷撰写始末，作者有明确交代：（1）出国时间。作者年轻时曾从交州短暂访问过扶南：“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2）出国目的。得知扶南诸国的丹砂等养生药物触地比目如瓦石灰壤，于是往而求之：“欲结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3）访问范围。由日南郡象林县海行至扶南，未再踏入其他国家，但于此接触了大量南来商旅人士。（4）撰写时间是作者晚年时：“余今年已及西……顾死将切近……”（5）撰写原因是希望借助丹经以长久流传，更多弟子可以广视听：“今撰生丹之国，纪识外邦，并申愚心，附于《金液》之后，常藏宝秘，则洪辞永全。……今以羸文结托真书，求自存录者也，诸弟子可以广视听也。”

以上撰写始末，与上文所述关于葛洪的三个基本事实，不仅毫无抵牾之处，而且合情合理、严丝合缝。兼以今人研究已揭明的其他事实，如《抱朴子》载很多印支事物、本卷自述与葛洪生平相合等，我们几无理由再怀疑葛洪是真正作者。若再对作者的思维方式、典故用语、人情关系等个性因素进行考察，可进一步发现其思想与葛洪的确相合。

思维方式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即感慨“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有清醒认识。葛洪继承了道家认识论的基本精神，坚定认为“天下之事，不尽可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对于超常之事总是强调不能以“常识”断定其无有。例如神仙问题，他主张：“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稟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不过葛洪的认识论有其独特性，即非常重视科学实证。如俗人不信水晶可以人工合成，他说：“外国作水晶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晶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夫所见少，则所怪多，世之常也。”（以上葛洪三段话皆引自《抱朴子内篇·论仙》）如俗人不信丹砂与水银可以互变，他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世人少所识，多所怪，或不知水银出于丹砂，告之终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从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烧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独得尔。”（《抱朴子内篇·金丹》）观之本卷，开始即强调天下之大“荡荡乎其远不可得而究”，肯定大九州说的合理性，而作者的依据，是其扶南之行的见闻。在介绍完诸多国家之后，卷末仍不忘强调“如此乃知天地广大，不可意度”，其思维方式与葛洪如出一辙。

典故用语方面，本卷有多处与《抱朴子》同，尤其是生僻典故，颇能说明问题。举四例如下：

①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2、172、292页。
 ②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32页。
 ③ 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58页。
 ④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第3485、3652、3501、3489页。

(1) 本卷云“献龙渊于屠肆,佩明珠于犬马”。《抱朴子外篇》多次用龙渊说理,如《逸民》“屈龙渊为锥钻之用”,《任命》“龙渊不能勿操而断犀兕”,《尚博》“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抱朴子内篇》则多次用明珠之例。如《塞难》“何异乎贵明珠而贱渊潭”,《祛惑》“凡探明珠,不于合浦之渊”。(2) 本卷云“虽使苏、张更出,陈、邴复生,见喻以机运之会,敦说以荣华为先”。苏、张指苏秦和张仪,世人多知其纵横捭阖之能。陈、邴指陈平和邴食其,为少见案例,而葛洪对此二人深为敬佩,如《论仙》云“弃、疾、良、平之智,端、婴、随、邴之辩”。(3) 本卷云“蕝薨之言,廊庙亦择;狂人之志,时有所合”。《论仙》有类似之语:“狂夫童谣,圣人所择。蕝薨之言,或不可遗。”(4) 本卷赞大秦“不畜奴婢,虽天王、王妇,犹躬耕籍田,亲自拘桑织经”。此乃葛洪赞赏之盛德,见《抱朴子外篇·诘鲍》:“帝王帅百僚以藉田,后妃将命妇以蚕织,下及黎庶,……衣食既足,礼让以兴。”

人情关系方面,本卷云:“俗人人既不能解于洪,洪亦复不能解于人。之面墙而不自知,鱼鳖之余,岂不哀哉!人视我如狂,洪眄彼如虫。”透露出作者与“俗人”间的紧张关系。而该问题在《抱朴子内篇》中也有很多生动表现:如《论仙》批评俗人“贪荣好利,汲汲名利,以己之心,远忖昔人”;《塞难》表达对俗人无可期待,“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则俟河之清,未为久也”;《金丹》记俗人对葛洪的批评,“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涂,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谓予有狂惑之疾也”;《黄白》谓“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予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这种紧张关系导致的结果,便是《抱朴子外篇·自叙》所云:“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绝。故巷无车马之迹,堂无异志之宾。庭可设雀罗,而几筵积尘焉。”“余以庸陋,沈抑婆婆,用不合时,行舛于世,发音则响与俗乖,抗足则迹与众违”。

上述三方面皆关乎作者个性,难以假手,其与《抱朴子》一致,进一步支持上文关于本卷作者的判断。众所周知,《抱朴子》内外篇的思想内容以及文风迥异,昔者清人有扬儒抑道者,嘲讽《内篇》“鄙诞可笑”,轻断其为伪书,结果谬以千里。葛洪一生著述宏富,除《抱朴子》外,“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①其涉猎之广,学识之博,令人叹服。但本卷在整个中古时期无他人提及,其自题“抱朴子序述”是为孤证,于历史研究而言,此最为忌讳之事,偏偏又依附于道经,故今人信之者寡。然求真务实乃学术之本,在没有发现证伪材料,反而证实材料诸多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剥夺葛洪的著作权。

三、今本《太清金液神丹经》的成书与卷下本原

以上对《神丹经》全书内容的分析表明,《张道陵序》为《神丹经》原有内容,撰于东晋后萧梁前;太清金液丹法撰于刘宋末萧梁初;鲍靓仙遇阴长生事在南北朝时已流传,出于葛洪的可能性不大;海外地理部分成书于刘宋以前无疑,出于葛洪之手可信。因此,全书内容都出世较早,可谓早期道教之要籍。不过,三卷内容究竟何时总成一编,还需综合审查。

整体上看,书中两个附录很突兀。首先,前附录的说明部分盛赞马明生和阴长生,声称要“书二君神光见世之言,自汉灵以来称说故事,附于丹经纪载之焉”。然而,前面金液丹法部分并未提及马明生,附录后文亦无其事例,更无汉灵以来称说故事。其次,与前附录分为说明和故事两部分不同,后附录浑然一体,写法迥然有别。再次,前附录云“附于丹经纪载之焉。诸有道者,可揽以进志也”;后附录却云“附于《金液》之后,常藏宝秘,则洪辞永全。……今以羸文结托真书,求自存录者也,诸弟子可以广视听也”,二者表达的情感差异显著,称呼所附对象亦不同。这些迹象表明,两个附录绝非《神丹经》原有内容,即《神丹经》最初并非三卷本。恰巧《神丹经》在唐代曾传入

^① 《晋书》,第1913页。

日本，被《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作“《太清金液（液）丹经》一卷”。^①可见，《神丹经》原本只有一卷，三卷本系增加附录而成，成书最迟在北宋初期。

上文指出，唐代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记载，陶弘景曾为梁武帝炼丹，选择丹法时提到当时有两种金液传世，贾氏注引陶弘景《登真隐诀》云：“一者太一金液，抱朴子所注，此乃可就，而阙在消石，兼无真人手迹，弥所未安。二者即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传，而用卤咸、虜盐，此世难多，兼祭法用牢俎，以为惮碍之也。”其“太一金液，抱朴子所注”，表明葛洪曾为其所受《金液丹经》作注。据笔者考证，从东晋至唐，《金液丹经》葛洪注本传承不绝，其主体内容流传至今，但文字有残缺，即《正统道藏》所收三卷本《抱朴子神仙金液经》之卷上。^②《抱朴子神仙金液经》三卷本编成大概亦在唐宋之际，其在残存的《金液丹经》葛洪注本的基础上，附入《抱朴子内篇·金丹》编成三卷。基于对三卷本《神丹经》和三卷本《抱朴子神仙金液经》的文本分析，笔者蠡测，《神丹金》卷下葛洪南海游记原来是《金液丹经》葛洪注本的附录，中古时期在流传过程中脱离原书，后人因不明“附于《金液》之后”一句“金液”真正所指，将其误编入《神丹经》。

《神丹经》卷下文本渊源的推论，可进一步夯实上文关于卷下时代和作者的判断。由于葛洪具有丰富的海内外地理学知识，加上其亲游海外的经历，使得卷下南海游记成为一篇较为严谨科学的地理学著作，对研究早期南海地理和海上丝绸之路有重要历史价值。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撰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言。

A New Study on the Last Volume of *Taiqing Jinye Shendan Jing*

Han Jishao

Abstract: The earliest text of *Taiqing Jinye Shendan Jing* (太清金液神丹经) was written between Ge Hong (葛洪)'s time and Tao Hongjing (陶弘景)'s time. The extant three-volume text contains four parts. The preface by Zhang Daoling (张道陵) belongs to the earliest text, written after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before Xiao-Liang dynasty. The content about alchemic methods of extracting golden liquid came from between the late Liu-So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Xiao-Liang dynasty. The story of Bao Liang (鲍靓) meeting up with Yin Changsheng (阴长生) had spread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its author was unlikely Ge Hong. The traveling not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written before Liu-Song dynasty undoubtedly. New evidences further confirm that it was indeed written by Ge Hong. The earliest text has only one volume. Later generations compiled the three-volume text between late Tang and early Song dynasty. The traveling notes was probably a part of Ge Hong's annotation of *Jinye Danjing* (金液丹经), which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ly geograph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Key words: *Taiqing Jinye Shendan Jing* (太清金液神丹经); Ge Hong (葛洪); Traveling not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Bao Puzi* (抱朴子)

(责任编辑：曹玉华)

①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38页。在该书第2165-2179页，孙猛考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公元891年。

② 韩吉绍：《魏晋南北朝衡制发微》，《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